

# 台灣地區

## 婦女政治參與的變遷

——周碧娥

有關男女兩性在政治參與，特別是在精英階層政治參與的差距是一個全球普遍的現象。因此改善婦女在這個層次的政治參與，增加女性在政治過程中的參與就成為多年來婦女努力的目標之一。然而經過戰後三、四十年的努力和聯合國「婦女十年」的大力倡導，婦女在這方面的努力却是效果不彰，成績平平。各國之中進步最多的首推北歐各國。她們的婦女在政府部門中的代表比例已接近百分之三十。美國最近的兩次選舉，婦女的成就也有許多可觀之處。但是這些成果距離女性掌握二分之一代表比例的男女平等的理想仍然差之甚遠。

本文旨在探討我國的政治過程中性別差距的本質，而以下列兩問題為討論的重點：第一是描述男女兩性在不同層次的選舉政治的參與程度的差距及其在過去三十多年的變遷；第二是探究選舉過程有那些因素阻礙婦女的參與，以比較男女兩性的候選人比例和當選機率為分析重心。本文的主要目的是藉現有的選舉統計資料的分析來勾繪出台灣地區婦女在過去三十多年來在政治過程中的地位及其變遷的風貌並淺談婦女參政阻力產生的階段。

現階段的台灣社會由於政治制度特殊及社會經濟快速變遷，存在著多種互相抗衡的社會勢力，因此使得台灣成為一個研究婦女政治參與的有趣局面。一方面，傳統中國社會父權體系之下，婦女地位低落，女性是附屬於男性的。另一方面，由於快速的經濟發展和現代化，近三十年台灣長足的進步使得婦女的教育水準和就業機會提高許多。此外，中華民國憲法早已明文規定男女平等，不

但以法律保障男女享有同等的投票選舉和被選舉權，更進一步以保障名額的方式來確保女性在政治過程中的代表比例。

本文的第一部分簡述政治參與性別差距理論，同時檢討有關中美婦女政治參與的實證研究結果；第二部分是現有選舉統計資料的分析來描述男女兩性在各級民意代表和公職人員選舉的代表比率及其在過去的三十年變化的趨勢。第三部分則是比較兩性在各級的參選率和當選率的差異及其在最近三十年的變化，企圖找出阻礙女性積極參政的癥結所在。最後結論部分除了摘錄研究結果之外，還根據這些結果對我國婦女地位的演變作幾項結論。為了使本文的討論更有意義和不覺脫節，讓讀者對我國婦女地位表現在其他社會經濟的特質有概括性的一般瞭解是必需的，因此，在進入本文主題的討論之前將先對台灣地區婦女地位作一扼要的介紹。

### 一、台灣地區婦女的地位

傳統上，中國文化一直被形容為是父權體系的代表，在傳統中國社會，婦女是附屬的地位，婦女的角色是為人女、人妻和人母。這些角色都是以家庭的需要為先，以父親、丈夫和兒子為依歸。所謂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和夫死從子，所以，婦女在這個傳統體制下並不具有獨立的人格。但是自一九一一年革

命之後，民國二十年所制訂的新憲法就賦與並保證女性在法律上的平等權。自此婦女不但享有與男性相同的受教育和就業機會和權利，也具有相同的參政權——投票權和被選舉權。此外，勞工法也明文規定男女同工同酬。自此女性在法律上的地位有了很大的進步，女性的平等權有了法律的基礎，但是實際的執行與法律的規定是否一致，則是另外一個問題。

再就婦女地位在其他方面的表現來看：近年來，由於台灣經濟的快速發展，婦女在受教育和就業機會也連帶改善許多。目前（一九八四年的資料），婦女的平均教育程度是受完七·三年的學校教育，而男性的平均完成教育年限則是八·八年。若以不識字者所佔該性別人口比例來看，女性成年人中有十八·二%不識字，男性成年人中則只有二·八%；以受完大專以上教育的人口比例來看，女性成年人中只有七·八%受完大專以上教育，而男性成年人則有十三·一%。可見兩性之間在完成教育的水準上仍有相當的距離。

雖然台灣婦女一向在農業和家庭事業扮演積極的角色，隨著台灣工業化的結果，女性參與家庭之外的勞力市場的就業也有顯著的增加。根據經建會的統計，在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三年台灣經濟發展達到高峰時，婦女勞力市場參與從三三·一%增加到四一·五%。這相當於年成長率七·五%。這個成長率不但比同時期男性的年成長率高出許多（三·一%），也是婦女勞力參與增加最快的時候。之後，由於經濟成長速度減緩，女性的勞力參與的成長率也連帶受到挫折，成長速度降低。在一九八一年時女性積極參與勞力市場的比率是四三·三%。女性就業大多集中於生產行業的作業員、買賣和書記的職業，部分服務業也是女性就業的主要機會。這樣的職業分析的結果使得女性所得遠不如男性，女性平均所得只有男性平均所得的三分之二。

就政治的地位來看：有關婦女參政權，自一九三七年我國憲法制訂完成以來就規定：凡是中華民國國民不分男女都享有公民權，包括投票權和被選舉權。再者，自一九五三年台灣地方自治實施以來就規定，在各級地方民意代表選舉中應設有婦女保障名額。台灣地區的選舉可以分為兩種不同層次：一是中央增額公職及民意代表的選舉，這個包括直接民選的國民大會代表和立法委員；另一種是地方公職及民意代表的選舉，包括省市議員選舉、縣市議員選舉、鄉鎮

民代表選舉和縣市長和鄉鎮長，之下還有里鄰長的選舉（不過，里鄰長的選舉將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之內）。除了鄉鎮長和縣市長的選舉之外，其他各級民意代表的選舉都應設有婦女保障名額，至於其保障名額的多寡則由其他法律另行規定。詳細辦法已幾經修正又隨選舉而異，相當繁複，不在本文討論之內。大致而言，婦女保障名額最多不會超過每一選區的百分之二十五（即每四名必需保障婦女名額一名），平均起來，則婦女保障名額約佔百分之十（即每十名必需保障婦女名額一名）。而且，大部分的選區頂多只有一個婦女保障名額（因為選區全部名額超過四名時，每十名才增加婦女保障名額一名）。

此外台灣地區的選舉採得票佔多數者為當選，而非特定席位的競選，因此，當女性候選人中有任何一人得票超過當選標準時，婦女保障名額的目的就算達到，婦女保障名額就失去意義。只有在該選區有婦女保障名額，而女性候選人又沒有任何一人得票達當選標準時，女性候選人的得票數得分開另外計算，而以得票最多的一人為當選，達到保障名額的目的。保障名額尚有一個特性值得指出：那就是當某一選區有保障名額，但卻沒有女性候選人時，女性保障的名額仍需保留，不得由男性替代。不過，這種情形很少，三十多年來只發生兩次。

## 二、性別差距理論

企圖解釋男女兩性在政治參與有巨大差距的理論一般可分為三類：第一類就是所謂的差異政治社會化理論（Theory of differential political socialization）。這類理論認為女性的政治參與之所以低，主要是來自她們在孩提時代或成年時候所受到的政治社會化的過程與男性不同，以致女性不會對政治發生興趣，因此對政治事務不關心，當然就更不會對政治崗位有嚮往。相反地，家庭和學校的社會化過程往往將女性的人格塑造為固定的人格特質，以適合家庭角色而不適合政治角色，甚至有礙或不利於女性對政治事業的追求。台灣地區和美國有許多研究的結果，證實女孩較男孩對政治的事不感興趣，知識也較少。在成年人中，女性通常要比男性以家庭的事務和角色為取向（黃，一

九廿一·江·九廿一· Hyman, 1959 ; Greenstein, 1965 ; Jennings & Langton, 1969 ; Jennings & Niemi, 1974 ; Rapport, 1981 ) 。

第二類理論可稱之為角色衝突論 (Theories of role conflict) 。強調女性因為雙重角色所引起的衝突為造成女性特殊政治參與型態的原因 (Githens & Prestage, 1977 ; Kirkpatrick, 1974 ; Sapiro, 1983) 。角色衝突或角色緊張可能來自女性本身對於為人妻、為人母和政治崗位的求不能互相協調或配合而引發的內心或態度的衝突。角色緊張也可能來自社會對於女性的傳統角色對家庭的義務的期望而帶來的外在的壓力。美國的一些實證研究發現，角色衝突的現象可以用來解釋女性在政治參與的邊緣性 (marginality) 。同時也發現女性的雙重角色與她們在政壇上起步較晚和容易自我限制有關。許多政治女性 (political women) 不願再追求更高的政治職位以避免造多的角色義務的衝突 (Githens & Prestage, 1977, 1982) 。

性別差距的第三種理論是結構論，強調結構上的限制和因素對女性參政所產生的阻礙 (Diamond, 1976, 1977 ; Flora & Lynn, 1977 ; Kirkpatrick, 1974 ; Githens, 1977 ; Welch, 1977) 。結構上的限制的運作可以透過各種不同的管道和以不同的方式出現。首先由選舉的制度和過程來看，歧視可以分為兩種：一方面是外顯 (overt) 的歧視，例如選民由於傳統性別刻板印象而產生的對於女性候選人的政治能力的偏見。另外一方面，結構性的限制也可以較微妙 (Subtle) 的方式發生歧視的作用。這種情形最常見的就是政黨或政治領袖對女性候選人的提名和支持不熱心，特別是在重要選舉時這種性別歧視更容易發生。台灣地區現行的婦女保障名額制度及其實施辦法也可能產生微妙的歧視作用。這種結構性因素影響之下的後果之一就是所謂的「渴望性假說」 (Desirability hypothesis) 。所謂 Desirability hypothesis 指的是：隨著政治職位的聲望、權力或影響的升高，女性參與的程度或代表的比例呈減減的現象。也就是女性代表比例或數目與政治職位的報酬 (rewards) 或選舉層次的升高呈相反的關係，或甚至在同一層次的選舉，性別比例也會隨競選的職位的令人渴望度而有差別。以美國的情況而言，女性的參政通常集中於地方和州的選舉，而聯邦層次的國會的席次則以眾院為主，參院的女性總

是聊聊無幾 (通常一至二人) (Diamond, 1976 ; 1977 ; Engstrom, et al, 1984) 。

結構性的限制還可能來自選區的社會結構，特別是人口及社經發展程度 (Kaning & Walter, 1976 ; Karing & Welch, 1979 ; Rule, 1981) 。根據現代化的理論，一個地區的社經發展程度與該地區的政治文化有密切關係。隨著一個地區的都市化和教育程度和所得水準的提高，其政治文化也會跟著開放和漸趨開明。而政治文化開明的結果之一就是對非傳統政治勢力或團體的容忍和接納。因此，對女性這個非傳統政治團體的參選就比較不會歧視和排擠。社區的社經發展帶動女性參政的增加還有另外一個理由。隨著一個地區的社會發展該地區的女性也會較多的機會接受高等教育和從事非傳統的職業，結果之一就是「合格的」 (qualified) 的政治女性的人數會增加，因此可能參選的潛在女候選人就多了。總之，不論過程如何，理論上，我們可以預期：就同一層次的選舉都市化和社經發展較高的地區通常會有較多的女性參政或較高女性代表比例參與政治過程。

除了上述的直接方式之外，結構性的限制也可以間接方式，透過對的知覺和看法 (perceptions) 的影響來減低女性參選的興趣。假如女性對當選的主觀看法或評估很低，認為選民政黨有性別歧視，不願支持女性，她們對參選的意願當然就不高，參與競選的候選人自然就會減少。美國有些研究證實這種方式的確也是與婦女參政不踴躍的理由之一 (Darcy & Schram, 1977 ; Fowles, Perkins & Rinehart, 1979) 。

致於一個地區的人口與女性政治的參與則有兩種不同的關係：一方面是人人口多，異質性高，因此政治文化的容忍性也會高，這就是所謂的都市化的正面效果。另一方面則是人口多意味著競選的職位的權力大、待遇好，對男性的吸引力也會大，所以可能會降低女性的機會，這可說是 desirability hypothesis 的負面效果，不過這種情形發生在美國機會要比在台灣的機會大。

有關台灣地區的婦女參政和性別差距的研究到目前為止並不多 (薛一九七三；范一九八二；洪一九八五；Chou & Clark, 1985) 。而美國方面的研究雖有不少，但這些研究的結果並沒有一致的發現和定論。每一個理論都得到或

多或少的支持 (Githens, 1983; Krauss, 1974)。假如以美國的研究發現為基礎，將這些理論架構應用到研究的問題上，下列幾個假設是可以預期的：

1. 就現況而言，根據 *Desirability hypothesis*，女性的代表的比例將與角逐的席位的渴望性（聲望、影響力）成相反的關係。也就是說，為角逐的席位或選舉的層次聲望愈高或影響力愈大時，女性代表的比例就會愈小。

2. 就變遷而言，根據政治文化學 (*Political Context hypothesis*) 當一個地區的都市化和社會發展程度愈高，婦女參政的可接受性愈大，婦女代表的比例會增加。所以隨著台灣地區在過去三十多年的都市化和社經發展，婦女代表的比例應會增加。而且就同一時期來看，愈都市化或愈高度發展的選區，女性代表的比例應比另一極端的選區高。

3. 就影響婦女參政的結構阻力而言，限於資料，本研究只探討選舉過程中的兩種阻力，直接來自選民的性別。

### 三、資料來源與分析方法

有關台灣地區婦女對選舉政治的參與的現況和過去三年的變遷和趨勢所使用的資料主要來自中央選舉委員會所出版的中華民國選舉統計提要。其他的資料包括該會所出版的其他選舉統計。台灣省的選舉函蓋的期間自民國四十年至民國七十一年。台北市議會選舉則自民國五十八年至七十年。高雄市議會的選舉則只包括民國七十年的第一屆選舉。在這些日期之前，台北市議會和高雄市議會是台灣省議會的一部分。台灣省選舉除了省議員選舉之外，還有縣市長、縣市議會、鄉鎮長及鄉鎮代表會的選舉。村里長的選舉由於職權有限加上資料繁複，因此不列在本文分析之內。縣市長和鄉鎮長的選舉職位屬於行政公職人員性質異於民意代表職位，但因歷年（至一九八一）婦女無人當選或人數太少，統計分析不合適，只在討論中指出此現象的實質意義。中央公職及民意代表的選舉則包括自民國五十八年開始的第一屆台灣地區增補選中央民意代表至民國七十二年增額中央民意代表的選舉共有五次立法委員選舉和四次的國大代表選舉。監察委員的選舉性質不符本文旨趣，不包括在討論之內。

婦女代表比例 (*female representation*) 是用來測量台灣地區婦女參與選舉政治的程度的指標。所謂婦女代表比例是指女性民意代表佔各級選舉當選的民意代表總數的百分比。婦女參政的變遷和趨勢則由歷年來女代表比例的增減來測量。此外，婦女保障名額和實際當選名額也將被用來指示婦女參與政治地位的實質進步之程度。致於結構性因素的測量，兩性當選率 (*electability*) 將被用來反映選民對兩性候選人的支持，參選率 (*candidacy*) 的比較也將被用來顯示歧視可能使女性產生阻礙，降低參選意願的影響。

要試測前述三個假設是否有效，使用的統計方法將隨著變項的性質不同而異。對於差距性質的變項 (*interval scale variable*)。七一測驗可以作為比較兩個平均數之間差異的顯著水準。而 *pearson correlation* 則用來表示兩變項的相關程度。當變項是名目變項 (*minimal scale variable*)  $X^2$ -測驗和 *Contingent Y C* 則分別用來分析差異與相關的統計方法。嚴格來說，七一測驗的統計方法並不完全恰當。因為資料所使用的並非樣本而是母體資料之所以使用該方法於部分的分析主要是借重該統計的提示作用。因此在解釋這些統計的意義應該有此瞭解。

### 四、婦女選舉政治參與的現況：性別差距的程度

表現台灣地區各級選舉中男女兩性政治參與的差距的程度一個簡單明瞭的方法，就是比較兩性在各級選舉當選總數所佔的百分比，也就是性別的代表比例。表一所示的資料是民國七十、七十一的選舉，女性當選人佔各選舉當選人總數的百分比（男性所佔百分比則一〇〇%—女性代表%）。表的資料顯示：到上一屆的選舉為止（即民國七十年的中央及地方公職及民意代表及民國七十年的中央增額民意代表選舉）女性沒有一人當選或曾當選為縣市長的；即使在鄉鎮長的選舉，三一二位之中才只有三位鄉鎮長是女性，不過，這個數字已是歷屆鄉鎮長選舉中女性表現最好。在這之前的八屆選舉中，只有三位女性曾當選。總之，就地方行政首長的選舉，女性的代表比例非常的低。不過在民國七十五年的選舉已有顯著的進步。不但縣市長有兩位是女性，女性鄉鎮長也增

表一：民國七十、七十二年台灣地區各級選舉男女民意代表  
名額及所佔比例

選舉層次	總數	男	女		
			保障名額	實際名額	差異
中央級			12(.082)	19(.130)	7(.048)
立法院(民國七十年)	70	63	5(.071)	7(.100)	2(.029)
立法院(民國七十二年)	71	63	5(.070)	8(.113)	3(.043)
國民大會	76	64	7(.092)	12(.158)	5(.066)
省市級			19(.112)	23(.135)	4(.023)
省議會	77		9(.117)	10(.130)	1(.013)
台北市議會	51		5(.098)	7(.137)	2(.039)
高雄市議會	42		5(.119)	6(.143)	1(.024)
地方級			89	(.144)	
縣市長	19	19	0	0	0
縣市議會	799		89(.111)	115(.144)	26(.033)
次地方級				(.132)	
鄉鎮長	312		0	3(.010)	3(.010)
鄉鎮代表	3699		397(.107)	490(.132)	93(.025)

加了一倍，有六位。  
在民意代表的選舉中，表一的資料有幾個現象值得注意：第一，女性在各級選舉所佔席次約為百分之十至十五。詳細的說，假如將民國六十九與七十二年中央增額立法委員選舉合併計算的話，那各級選舉中女性代表比例最高的是

在縣市議（一四·四%）；最低的為立法院（一〇·七%）。省市議會居中（一三·五%）。假如將各級民意代表的選舉按其渴望性（desirability），例如聲望、影響力或權力，分成不同的階段，表一的結果顯示：女性所佔的比例與選舉的層次有負向的關係。選舉的層次愈高，即競爭的職位聲望愈高，女性代表所佔的比例愈小。所以女性在立法院的比例最低，其次是省市議會，最高的則是縣市議會。這種情形的兩個例外是女性在國大代表和鄉鎮代表所佔比例。在民國六九—七十年的選舉，女性國大代表共有十二名，其中包括七名婦女團體保障名額，佔全部國代的十六%左右。這個比例為各層選舉最高。而在鄉鎮代表中，女性代表共有九三位，佔總數的十三%，是女性比例次低的，僅高立委的女性代表比例，但却低於縣市議會的女性代表比例。女性之所以在這兩個民意代表團體中所佔的比率會與預期相反可能與這兩個民意機構的性質有關。現在國民大會代表的職責主要選舉、罷免總統和副總統，並沒有其他立法或監督的職權，因此雖屬中央級民意機構，其聲望權力和影響力與具有立法及監督的民意代表機構當然不同。再加上國代選舉中設有七名的婦女保障名額，這種人為的因素也會使得女性在國代所佔的比例提高了。至於鄉鎮代表會婦女之所以偏低則較不清楚。可能的解釋之一是和女性在鄉鎮長選舉的表現有關。部分有志於此一層次的地方政壇的女士將目標放在鄉鎮長選舉而不集中於鄉鎮代表。所以分散了部分的可能當選者，結果女性在鄉鎮代表雖偏低，但却有三位女性鄉鎮長。反之，縣市長的選舉女性的機會幾乎等於零，女性可能集中精力於縣市議會，因此後者的比例也就升高。

其次分析在同一層次的選舉婦女在不同地區的選舉的表現是否與競爭的職位的聲望成相反比呢？若以台灣省議會、台北市議會和高雄市議會為樣本，並按其影響力和代表選區的大小依序排列，「渴望性假說」預期女性在台灣省議會比例最低，台北市議會其次，高雄市議會最高。表一的資料顯示：女性在這三個民意代表團體的比例分別為一三·〇%、一三·七%和一四·三%。這個結果給予「desirability hypothesis」更進一步的支持。

婦女對政治過程的可及性除了用女性代表比例之外，在台灣現行的特殊保障名額制度之下，還可以從婦女實際當選的人數與保障名額的對比來看。表一



亦列有此資料。比較各層次的選舉，婦女實際當選的人數却比保障的名額多，但是幅度却不大，最多不超過七%。其中尤以國大代表的選舉，婦女的成就最大。在各個不同層次的立法監督議會中，婦女超額當選女性在比例最低的是在臺灣省議會，最高的則是台北市議會。但是女性在立法委員的選舉表現亦不差。為什麼從這個角度來看，婦女代表的比例呈現非常不一致的分配，本研究限於資料性質不能探討，因此不得而知。不過有兩個事件值得提出：一是候選人本身條件可能影響選舉結果。第二，台北是台灣地區首善之區，都市化程度高，生活水準最富足，政治風氣最開放，這些特質都是有利於婦女的政治參與。台北之所以有最高的婦女超額當選是否暗示「地利」之便（contextual effect）的說法倒是值得將來研究的題目。

總之，表一的結果顯示：假如婦女代表比例可以作為指示婦女政治參與的地位的適當測量的話，目前台灣地區婦女的地位並不特別令人興奮，雖然有婦女保障名額，而且婦女通常也能選出被保障的名額，女性民意代表的比例還是介於百分之十至十五。這個比例距離男女平等的理想還有相當的差距，而且也不見得比沒有保障名額的國家婦女的代表比例來得高。再者，婦女代表比例的高低似乎有隨著選舉層次或競選職位的升高而呈現下降的關係。

### 五、婦女政治參與的變遷：進步或停滯

為了描述婦女政治參與在過去三十多年的變遷，並使上面的討論能前後連貫，表二列有民國四十年至七十二年台灣地區各級民意代表選舉婦女所佔的比例。選擇民國四十年作為討論變遷的起點並非完全沒有理由。因為自民國四十年開始，大部分的選舉統計資料都已整理出來而且比較完整，因此資料可靠性較高。同時，民國四十年也常被認為代表台灣現代經濟發展的開端。民國四十至七十年正好涵蓋了台灣經濟發展及社會、政治變遷的不同階段。

表二所列的資料中關於婦女政治參與的變遷可分三個層次來討論：首先，由中央立委的選舉來看，自民國五十八年第一次增補額選舉以來，婦女名額所佔的百分比的變化很小，自民國五十八年的九%增加為民國六十四年的一〇%。

表二：台灣地區歷屆各級民意代表選舉、當選人總數、女性代表所佔比例及實際當選人數對婦女保障名額比較

年度 (民國)	立法院			國民大會			省議會			台北市議會			縣市議會			鄉鎮代表 <sup>+</sup>		
	總數	百分比	比數	總數	百分比	比數	總數	百分比	比數	總數	百分比	比數	總數	百分比	比數	總數	百分比	女
39/40							55	.090	5/5				814	.085	69/70	9778	.002	24
41/42													860	.086	74/74	5695	.002	11
43/44							57	.105	6/6				928	.101	94/94	6397	.086	550
46/47							66	.136	9/9				1025	.099	101/102	6834	.092	628
49/50							73	.137	10/9				929	.102	95/91	5260	.125	660
52/53							74	.135	10/9				907	.136	123/108	4776	.086	385
57/58	11	.091	1/0	15	.133	2/2	71	.155	11/10	48	.146	7/4	847	.145	123/100	4709	.106	497
61/62	36	.111	4/3	53	.151	8/5	73	.164	12/10	49	.143	7/4	850	.140	119/99	3757	.101	378
66/67*	37	.108	4/3				77	.169	13/10	51	.157	8/5	857	.141	121/93	3793	.129	488
70/71*	70	.10	7/5	76	.158	12/7	77	.130	10/9	51	.137	7/5	799	.144	115/89	3699	.132	490
72	71	.113	8/5							42	.143	6/5						
總數	225	.107	24/16	144	.153	22/14	623	.138	86/77	199	.146	29/18	8814	.117	1034/920		.107	

\*這兩次立法委員選舉分別為民國六十四年和六十九年

+鄉鎮代表選舉的保障名額資料不全，不能計算實際對保障名額比數

資料來源：中央選舉委員會，中華民國選舉統計提要（35年～71年）。

八到民國七十一年的一一·三%。十四年來婦女代表比例只增加了二%。若增加的速度來看，這個二%的增加却代表了十四年有二四%的成長，或平均每年以一·七%，或每屆十六%的速度增加。致於國大代表的選舉，由於受到婦女團體保障名額的影響，婦女的參與率通常較高，儘管如此，就女性代表所佔百分比在過去十四年的三次增補選中的成長幅度和立法委員的選舉却不相上下，也只增加二·五%。由五十八年的一三·三%增加為六十九年的一五·八%，也就是等於十九%的成長，或每屆六%的增加。

其次看省市議會的選舉：女性所佔名額在這次層次增加的幅度較大。民國四十年的第一屆臨時省議會中只有五名女性，佔九%。民國五十二年開始有十名的女性議員，此後二十年女性代表的比例持續增加，由五十三年的一三·五%增加為五十七年的十五·五%，然後六十年又增加到一六·四%，於六十六年達到最高點十七%。換另一種說法就是從民國四十年到六十六年約莫三十年間，台灣婦女在省議會的代表比例增加了七·九%，相當於八九%的成長率。這是非常可觀的增加，可惜民國七十年的選舉女性所佔比例却反略有減低（十三%）。婦女在台北市議會所佔的比例變化的趨勢與台灣省議會的情形非常一致。不但女性所佔比例的程度接近，而且也先有持續成長，後一略有降低，從民國五十八年的第一屆的十五%增加到六十六年是一五·七%，七十年時降為一三·七%。就增加的幅度而言並不多（一·一）與同時期的省議會類似。

在縣市議會的選舉，婦女的參與在討論的三十年間也享有持續不斷的增加。從民國四十年的六十九位（八·五%）增加到五十年的十%，然後又增加到五十七年的一四·五%。此後保持穩定並微量增加，民國七十年的選舉女性代表佔一四·四%，並沒有類似省市議會的略減的現象。以七十年和四十年來比較，三十年間女性縣市議員的比例增加了六%，等於六九%的增加率。

鄉鎮代表的選舉有一點不同。鄉鎮代表選舉開始的幾屆由於法規尚未制訂完全，資料也零亂不齊。假如將這幾屆摒除不計，然後由民國四十四年第五屆的選舉作為起點，將近三十年來婦女在這個層次的參與也有不少的進展。女性鄉鎮代表所佔比例共增加了五%，相當於五三%的增加率。婦女在這個層選舉

的參與的變化雖然大致趨勢是持續增加，不過起伏也很大。例如民國五十年時曾達到一二·五%的代表比例，却於次屆選舉降為八·六%。

總括而言，若從選舉結果女性所佔的名額和比例來看，台灣地區婦女的政治地位在所研究的三十年間的確有些進步，不論是在中央或地方的民意代表的選舉都有增加的趨勢，其中以女性省市議員增加的幅度和速度為顯著，而國大代表的增加為最小。縣市和鄉鎮的增加亦不小。就增加的持續性而言，則以婦女在縣市議員的成長最穩定。不過，整體而言，婦女在各個選舉層次都呈現正成長，如若將十年當作一個階段，則每一階段都有改善。

然而這些進步是否能代表真正的進步？我國政治體制特殊，對女性的政治代表權設有保障名額，而保障的名額又隨著社會變遷的政治發展每有變動。雖然保障的名額大致上都維持在同一水準，所佔的比例變動幅度不大，但是婦女代表名額所佔比例的增加仍然可能受這個人為因素的影響。為了澄清此一困擾，表二列有「實際名額對保障名額比數」一欄。這個比數表示婦女在「保障」名額之外對政治過程的獨立可及性，因此也許更進一步反應婦女政治地位的進展。

表二的比數有下列幾個特點：一、從整體來看，不論在那一層次的選舉，婦女對政治過程的可及性都確實有逐漸增加的趨勢。也就是說，在所有選舉裡，民國五十年之前的早期選舉政治，女性所佔的名額都是由保障名額所賜（比數等於一），甚至有時連保障名額都無法填滿。婦女對政治參與的意願由此可見一斑。不過從民國五十年以後，這種「不足額」的或同額競選的情形就不再發生（比數大於一），婦女除了填滿保障名額之外，也開始而且維持有獨立不受保護當選的名額。並且這種例子有逐漸增加的趨勢。二、比較不同層次之間的選舉還可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那就是女性的獨立當選的多寡似乎與選舉的歷史長短成負相關。選舉歷史較短的，女性超額當選的比數較大，反之，歷史較長的選舉，女性超額的比數較小。所以在台北市議會、國民大會和立法委員這些歷史較短的選舉，女性超額當選的較多。他們平均比數分別為一·六三，一·四三和一·四二。而在省議會、縣市議會的選舉，婦女的平均超額就較小了，只有一·一二。

為何女性會在歷史較短的選舉中佔較有利的機會可以推測的理由有二：一方面可能是因為這幾個選舉受到大都市的名額分配比重的影響大，而大都市又是比較有利於女性參政的，所以台北市議員選舉女性的超額最多。而國代和立委的選舉台北、高雄都是另一個選區，女性的表現也不差。當然這些超額當選的女性代表是否以大都市選區居多有待實際資料證實。第二個可能是來自「選擇性」效果（selection effect）。由於這些歷史短的選舉，選舉開始的日期當然在後，所以也許有後來者的優勢。再加上這些選舉的層次高、地位高，所以選擇參與競選的女性候選人可能都是有經驗的政壇老將，或政治條件良好的候選人，不但知名度高，競選經驗熟練，當選力當然就提高，因此較不需要依賴保障名額而上榜。反觀省議會和縣市選舉，鄉村地區的比率較大，女性競選而可能面對的阻力和困難也較大，再加上報賞有限，衡量得失，有志的知名女士可能較易裹足不前或不願傾囊而出、全力出擊，所以超額當選的機會就相對減少了。

總結表二的討論，有一點可以確定：不論從女性代表實際名額所佔的百分比或實際對保障名額的比數來看，台灣地區的婦女的政治地位是有進步。雖然進步的幅度嫌小、速度也嫌緩，但大致呈現持續和穩定的增加。尤其重要的是女性超額，非保障當選的比數更是持續增加。假如這個比數是能真正測驗政治參與的地位，那麼由過去三十年的資料所顯示的趨勢看來，婦女政治地位的進步也較令人滿意，而且遠景也可能較樂觀。

## 六、影響婦女政治參與的因素：參選率與當選率的比較

兩性在政治過程參與的差異除了表現在代表名額和比例差異外，還可能出現在兩性參與競選的候選階段和當選的階段。比較兩性在選擇過程的這兩個階段的差異對於了解女性之所以參政低落也許可以提供一些線索。有關影響婦女參政程度低落的原因，前面文獻評述曾提到選舉過程有兩個因素可以阻礙婦女對選舉政治的可及性：一是來自選民對候選人的偏見而引起的對女性候選人的敵意或不支持。另一個則是女候選人人數稀少。有關第一個因素研究發現結論

表三：台灣地區歷屆各級民意代表選舉總當選率\*，男性當選及女性當選率

年度 (民國)	立法院			國民大會			省議會			台北市議會			縣市議會			鄉鎮代表		
	總率	男	女	總率	男	女	總率	男	女	總率	男	女	總率	男	女	總率	男	女
40							.393	.391	.416				.446	.435	.595			
41-42													.466	.485	.330	NA	NA	NA
43-44							.518	.554	.333				.588	.580	.662	NA	NA	NA
46-47							.559	.594	.409				.632	.636	.601	NA	NA	NA
49-50							.579	.583	.556				.570	.569	.586	.595	.592	.618
52-53							.540	.520	.714				.580	.588	.535	.561	.560	.579
57-58	.440	.476	.25	.517	.418	1.00	.550	.545	.579	.623	.594	.875	.671	.687	.591	.606	.599	.675
61-62	.654	.653	.667	.679	.662	.80	.603	.610	.571	.777	.764	.875	.574	.574	.578	.674	.668	.728
66-67**	.606	.579	1.00				.616	.627	.565	.836	.811	1.00	.674	.681	.637	.587	.592	.558
70-71**	.321	.313	.412	.411	.381	.706	.387	.406	.294	.614 高雄 .519	.611	.636	.475	.469	.509	.551	.550	.555
72	.415	.423	.364								.545	.400						
總數	.487	.489	.539	.536	.487	.835	.527	.537	.493	.674	.665	.257	.568	.570	.562	.596	.594	.619

\*本表所算的當選率與其他方法算出來的當選率（Karing & Walther, 1976）數值接近。

\*\*這兩次相當的立法委員選舉分別為民國六十四年和六十九年。

資料來源：中央選舉委員會出版，中華民國選舉統計提要（35年～71年）。



不一。選民對性別的偏見與候選人的特質和競選的職位有關，很難一概而論。關於第二因素，大部分的學者似乎都同意選票上的女候選人「聊聊無幾」是婦女參政的主要阻力之一。比較兩性在所謂參選率（或候選率）與當選率的差異可以用來作為試探此種說法是否適用於台灣地區的依據。

所謂當選率，顧名思義，指的是一個候選人在一次選舉中當選的機率。計算的方法通常是一除以全部候選人。以此類推，男（女）候選人的當選率就是所有男（女）性候選人人數除以候選人的總數（包括男女）。表三列的是歷年來男女兩性在各種選舉的當選率及其總平均。

如果將所有民意代表的選舉當作一個整體來看，表三的資料並沒有顯示男性對女性有明顯的或絕對的當選優勢，相反地，男女各有優劣，而女性似乎還略勝一籌。一般而言，男性候選人在地方性的選舉勝算的機會要比女候選人多一些，特別是在台灣省議員的選舉。歷屆省議員選舉的平均而言，男性當選的機會在二分之一以上（五三七），而女性則不到二分之一（四九三）。在中央級的選舉和院轄議員的選舉，女性獲選的機會要比男性同僚大。例如立法委員選舉男性候選人只有一分之一的機會當選，但女性同僚却有二分之一強的機會，正好與省議員選舉相反。台北市議員和高雄市議員的競爭中，女性候選人有將近百分之八十的當選機會，而男性只有百分之七十左右而已。國民大會代表的選舉，女性當選的機會更比男性多一倍，各為八四和四九。這顯然是受到婦女團體保障名額競選的影響。

以上是就歷年的平均來看。平均數有一缺點，就是容易受到特別高或特別低數字的扭曲而失去代表性。因此，要全盤了解男女兩性當選機會的相對優劣勢，仔細檢閱歷年來男女當選率的變化和趨勢是有必要的。檢閱表二的歷年資料顯示：長期看來，男女兩性當選率的差異並沒有不一致不變的型態。隨著選舉的層次不同，男女候選人在不同的時期：各有其相對的優勢和劣勢。大致看來，在過去多次的省議員選舉，男性當選的機會比女性候選人要佔優勢。但是女性在台北市議員選舉多年却一直保持領先的當選率。國民大會代表當然也屬於女性優先的。致於在其他的選舉中男女立委候選人當選機會非常接近，而且不同時期各有興衰。縣市及鄉鎮的十次選舉男女候選人的成績平分秋色，形成拉

鋸戰的局面。表三的資料還有一點值得注意：就是從歷年的統計來看男女兩性當選率的變化並沒有一個明顯的變遷的型態可言。然而，若將十年當作一個階段來看的話，則婦女的當選率在過去的三十年大致上有進步。就以省議員和縣市議員選舉為例，在五十年代，女性候選人的平均或預期當選率大約四十%（省議員）或五五%（縣市議員），而六十年代則都在五五%以上，七十年代也略有增加但幅度不大。

總而言之，從當選率來看，男女兩性的當選機會並沒有一致的差異，兩者之中沒有一性有絕對優勢，不但在不同選舉層次各有優劣，在不同時期也各有興衰。所以女性並不見得較男性在投票所受了選民的虧待。

現在再看候選率的差異和變動：（表四）有一個現象很特出，不論是從平均數或歷年的逐年資料來看，不論在那一層次的選舉，男性候選人所佔的候選比例都一致比女性佔優勢，而且是佔絕對優勢，男性佔了每一個選舉候選人的百分之八十五以上，此外，表四還有幾個特點：一、女性的候選人比例除了普遍偏低外（不超過十五%），最低的是在中央公職及民意代表的選舉，平均只佔候選人總數的十%；在省市議員選舉則介於十五%與十二%之間，而以角逐台灣省議員的女性較多。縣市議員的女候選人佔十二%，鄉鎮佔十一%。二、長期的趨勢看來，女性候選人比例變動的幅度和方向不明顯。但如果將三十年的資料分為前後兩期來比較，則似乎有增加的傾向。前期的女性候選率上下起伏很大，後期的統計數就沒有太多上下的波動，呈現平穩中有微量的成長。但是需要強調的是女性候選人的人數仍然稀少，比例仍然很低，遠遠落在男性之後。

綜合表三和表四的討論有一點是可以確定：與男性比較，在選舉過程中台灣地區婦女的當選機會並沒有遭遇選民極為不合理的偏見和敵意而產生太大的阻力。（這個結果當然與保障名額有關），但是女性在候選人的提名和選拔階段則是絕對低於她們應有的代表比例。因而女性候選人稀少的因素變成現階段台灣婦女參政不多的主要阻力。換句話說，這些資料告訴我們：女性參政者之所以稀少主要是因為參與選舉的候選人太少而非女性的當選能力差。為了要進一步檢驗此一說法的正確性，民國七十年各級選舉男女候選人的得票數可以

表四：台灣地區歷屆各級民意代表選舉候選人總數，男性候選人百分比  
和女性候選人百分比

年度 (民國)	立法院			國民大會			省議會			台北市議會			縣市議會			鄉鎮代表		
	總數	男	女	總數	男	女	總數	男	女	總數	男	女	總數	男	女	總數	男	女
39-40							140	.914	.086				1827	.937	.063			
41-42													1844	.879	.121	NA	NA	NA
43-44							110	.836	.164				1579	.910	.090	NA	NA	NA
46-47							118	.814	.186				1621	.896	.104	NA	NA	NA
49-50							126	.857	.143				1629	.901	.099	8833	.879	.121
52-53							137	.898	.102				1563	.853	.147	7845	.922	.078
57-58	25	.84	.16	29	.931	.069	129	.853	.147	77	.896	.104	1262	.835	.165	7769	.905	.095
61-62	55	.891	.109	78	.872	.128	121	.826	.174	63	.873	.127	1480	.861	.139	5575	.907	.093
66-67*	61	.934	.066				125	.816	.184	61	.869	.131	1271	.851	.149	8460	.865	.135
70-71*	218	.922	.078	185	.908	.092	199	.829	.171	83 高雄	.867	.133	1683	.866	.134	6718	.869	.131
72	171	.871	.129							81	.815	.185						
總數		.892	.108		.904	.096		.849	.151		.864	.136		.879	.121		.891	.109

\*這兩次立委選舉分別是在六十四年和六十九年。

資料來源：中央選舉委員會出版，中華民國選舉統計提要（35年～71年）。

作為資料，然後以七一測驗的方法來檢定男女平均得票數差異的統計顯著水準，所得結果可作為驗證的根據。七一測驗的結果列於表五。

很明顯地，不論在中央級或省市級的選舉，男女候選人的平均得票數並沒有統計上的顯著差異。只有在縣市和鄉鎮民意代表的選舉，男女平均得票數有顯著差異，男性平均要比女性候選人多。為什麼在高低兩種不同層次的選舉會出現互相矛盾的結果呢？有兩個可能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因為縣市和鄉鎮的選舉，候選人數與保障名額的對比要比其他層次選舉高。

表五：民國七十年台灣地區中央及地方公職及民意代表選舉男性與女性候選人得票數差異之比較

選舉層次	男	女	t 值	d. f.	p.
中央級					
國民大會	(118) 40791.47	(9) 60203.22	1.65	125	.103
立法院	(135) 34014.67	(17) 49233.94	1.69	150	.093
省市級					
台灣省議會	(165) 30000.81	(34) 19660.78	1.77	197	.079
台北市議會	(72) 10620.96	(11) 9656.64	0.49	81	.624
地方級					
縣市	(1457) 3671.767	(226) 2990.49	3.68	1681	.000
鄉鎮*	(3851) 803.93	(605) 587.00	7.08	4454	1.000

\*鄉鎮資料有部份欠缺，所以，所得的統計或有差異。

。換句話說，就是在女性縣市議員和鄉鎮代表依額保障名額當選的比例較其他層次的選舉高。表一的資料對於這種揣測給予部分的支持。第二原因則可能是因為參與省市和中央民意代表選舉的女性候選人都是政壇老將或知名度高的菁英。也就是前面提到過的選擇性效果。因此她們爭取選票的能力當然不下於男性同儕，許多更是以高票當選，使得女性平均得票提高。這個揣測是否屬實有待進一步研究。

表五的資料雖然又提出更多的部分證據支持女性候選人稀少是阻礙婦女參政勝於婦女當選能力的說法，但是這個外加的發現只是基於一次選舉的統計，其說明力有限的，在進一步證實之前不能過份強調，何況當選率 and 得票數都只是測量候選人爭取選民支持和選票的結果，不能測量選民對候選人偏見透過其他媒介（mechanism）例如候選人的知覺，可能產生的阻礙效果。實際上，以訪談方式由個別女性參政者收集到的面對面訪談資料就證實：台灣地區的婦女參政者對於選民或政黨的性別偏見的知覺不但實際存在，而且這種知覺往往能有效產生阻止作用。女性由於意識或預期選民的偏見和政治團體不支持常常在候選人提名或登記之前就打消參政的念頭（Chou & Clark, 1985）經過這一過濾的階段，女性候選人就為數更少了。

## 七、總結與結論

本文試圖透過歷屆台灣地區的統計資料的分析來檢討婦女在過去三十年在選舉政治參與的情況和變遷的趨勢。同時藉比較男女在選舉過程的當選和候選兩階段參與的差異來推測兩者對女性參政所產生的相對阻力。以選舉統計為基礎所計算出來的不同統計則用來作為測量兩性在政治參與的各種指標，並以不同的統計分析方法作為檢驗假說的真確性。分析的結果關於台灣地區婦女參政的情況、變遷和相關因素可以歸納為下列幾點：

一、儘管現行台灣地區各級的民意代表選舉中都規定有婦女保障名額，婦女在選舉政治的代表比例仍然很低，只介於十%至十五%。在縣市長的選舉中，直到民國七十年沒有任何女性當選，而在九次的鄉鎮長選舉，也只有七

位女性，真是鳳毛麟角而已。

二、在民意代表選舉方面，女性代表比例有與競選的職位的「渴望性」或選舉層次的高低呈負向關係。所以女性在中央立委的代表比例最次，省市議會次之，縣市議會最高。

三、就過去三十年的變遷來看，台灣婦女在選舉政治的參與確實有些許進步。雖然這些進步幅度不大，但却能超越婦女保障名額的規定和跨越每一層次的選舉。

四、就當選率 and 候選率這兩個因素對女性參政的阻礙作用而言，比較兩性之間的差異發現：(1)不論是總平均數或長逐年資料，男性和女性在當選率方面沒有一方是佔絕對或一致優勢的，兩性各有優勢和盛衰。(2)但是在候選人比例則恰好相反。不論橫切面或縱剖面，男性候選人都佔一致而且絕對的多數。女性候選人的比例不超過十五%，而且歷年雖有增加的傾向却是速度緩慢。最後(3)男女兩性在選票爭取上並沒有單向的差異，性別與選舉層次有互動的關係。在省市議會和中央選舉，男女得票能力並沒有差異，只在縣市以下的民意代表選舉性別差異才出現。

從這些研究發現看來，我們可以作以下的結論：台灣地區婦女的政治地位並不如希望的好，除了在行政職位的選舉參與程度更低之外，在議會過程的代表也不高，不但實際的名額比例如此，保障名額的名目比例更如此。距離兩性平等的理想仍然很遠。有待加快進展的腳步和更多的突破，遠景才會樂觀。致於如何加快改善的速度，根據研究結果可以著手地之一就是增加婦女候選人的人數和比例。除了婦女要打破因傳統社會化或歧視意識而產生的自我設限或退縮的心理障礙之外，政黨和政治團體、領袖更應在提名和競選過程給予女性平等的支持或更多支持。在婦女得票能力並不下於男性的前提下，雙管齊下，隨著婦女的教育和職業成業的進步，要提昇婦女在選舉政治的參與地位就可加速了。

改善婦女政治參與當然還有另外一種最直接了當的方法，就是提高婦女保障名額和比例。婦女保障名額在民主選舉政治的初期和婦女地位普遍低落的時期，確實曾具有保障婦女代表數的意義。但是隨著社會的變遷、政治的發展，其原始目的和比例已不符時代的需要。任何保護措施，假如其內涵不能隨社會

的需要而修正的話，反易成為阻礙進步和改革的絆腳石。因為保護的措施不但易流為被攻擊的口實。「保護」更會使女性停留在政治的「少數民族」的階段。處於不平等和被動的地位。因此，保障名額制度與其保障當選的名額，不如保障女性的候選的名額和參選機會的均等。使得男女兩性同時受到平等機會參與參選與得到相同支持作公平競爭的保障。總之，如何改善或使得男女在選舉過程起步階段就有平等機會參與可能是今後努力的優先目標。

最後要說明的是造成婦女參政低落還有其他因素，改善的措施也就還有許多，本文限於所採用的資料不適於作這方面的分析，當然也就不能作這方面的建議。有關這方面的研究國外成果很多，國內的研究也漸出現，然而有待將來努力仍然許多。本文是藉現有資料台灣地區婦女政治參與地位作一探測性的研究，其目的在拋磚引玉；其用意是發掘問題大於回答所有的問題。

〔本文作者為中央研究院美國文化研究所研究員〕

## 參考文獻：

### 中文部份：

#### 中央選舉委員會

- 一九八二 中華民國選舉統計提要（卅五年——七一年）。台北：內政部。
- 一九八二 民國七十、七十一年選舉統計。台北：內政部。
- 一九八三 民國七十二年增額立法委員選舉概況。台北：內政部。

#### 江炳倫

- 一九七二 「台灣地區的政治文化與選民取向」，未發表論文。台北。

#### 洪秀菊

- 一九八五 「嘉義及新營地區選民對婦女參政的態度」，「亞洲地區婦女未來角色」會議論文集。台北：東吳大學。

#### 范玉芬

- 一九八二 「台北地區女性民意代表的政治參與的研究」，未出版碩士論文。台北：國立台灣大學。

#### 黃天從

- 一九七一 「台北市居民投票行為的研究」，未出版碩士論文。台北：國立政治大學。

#### 薛立敏

- 一九七三 「我國婦女參政之研究」，未出版碩士論文。台北：國立政治大學。

### 英文部份

#### Bax

- Baxter, S. and M. Sansing  
1980 Women and Politics: The Invisible Majorit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Blay, E. A.

- 1979 "Th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women in Brazil: Female Mayors." Signs, 5: 42-59.

#### Chou, B. E. and J. Clark

- 1985 "Reserved Seats' and the election of women to legislative bodies in Taiwan". Paper to be presented at the 1985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to be held in New Orleans, Aug. 28-31.

#### Council for Economic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 1984 An Analysis of the Utilization of Female Labor Force in Taiwan. Taipei.

#### Darcy, R. and S. S. Schramm

- 1977 "When women run against men."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41: 1-12.

#### Diamond, I.

- 1976 "Why are they there? Women in American state legislatur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Chicago.
- 1977 Sex Role in the State Hous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Engstrom, R. L., M. D. McDonald and B. E. Chou

- 1984 "The election of women to central city councils in the U.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even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Political Psychology, University of Toronto, Toronto, Canada. June 24-27.

- Flora, C. B. and N. B. Lynn  
1974 "Women and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Consideration of the impact of motherhood." in J. S. Jaquette (ed.) *Women in Politics*.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 Fowlkes, D., J. Perkins, and S. I. Rinehart  
1979 "Gender roles and party rol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3: 722-780.
- Githens, M.  
1983 "The Elusive Paradigm Gender, politics and political behavior: the State of the art." in A. W. Finifter (ed.) *Political Science: The State of the Discipline*. Washington, D. C.: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 Githens, M. and J. L. Prestage (eds.)  
1977 *A Portrait of Marginality: The Political Behavior of the American Women*. New York: David McKay Co..
- Greenhalgh, S.  
1985 "Sexual stratification: The other side of growth with equity in East Asi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1(June): 265-314.
- Greenstien, F. I.  
1965 *Children and Politic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Huang, N. C. and S. C. Lee  
1985 "Women in Taiwan, 1975-1985: Alternative report on the impact of the decade of wome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sian Women's Conference in Davao City, Philippines, April 23-27.
- Hyman, H.  
1959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A Study in the Psychology of Political Behavior*. New York: Free Press.
- Jaquette, J. S. (ed.)  
1974 *Women in Politics*.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 Jennings, M. K. and K. Langton  
1969 "Mothers versus fathers: The formation of political orientation among young Americans." *Journal of Politics*, 31: 329-357.
- and R. G. Niemi  
1974 *The Political Character of Adolescence: The Influence of Families and Schools*. Princeton: University of Princeton Press.
- 1978 "The persistence of political orientations: An overtime analysis of two generation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8: 333-363.
- Karing, A. K. and S. Welch  
1979 "Sex and ethnic differences in municipal representation."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60(Dec.): 464-481.
- and B. O. Walter  
1976 "Election of women to city councils."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56(March): 605-613.
- Kirkpatrick, J.  
1974 *Political Women*.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6 *The New Presidential Elite: Men and Women in 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Basic Books.
- Krauss, W. R.  
1974 "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gender role: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8: 1706-1723.
- Rapoport, R.  
1981 "The sex gap in political persuading: Where the structuring principle work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5: 32-47.
- Rule, W.  
1981 "Why women don't run: the critical contextual factors in women's legislative recruitment."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34(March): 60-77.
- Sapiro, V.  
1983 *The Political Integration of women*.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Sivard, R.  
1985 *Women: A World Survey*. New York: Ford, Rockefeller and Carnegie.
- Welch, S.  
1977 "Women as political animals? A test of some explanations for male-femal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differenc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1: 711-729.  
1978 "Recruitment of women to public office."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31: 372-381.